

内部资料 注意保管

东亚经纬

2016年第3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萨德入韩，美国一举三得（李宗勋）.....	1
中日韩海洋文化研究动向（安成浩）.....	6
“一带一路”东亚战略思考（王勇）.....	11
当代韩国工人运动典范： Yoosung 工会运动(2011-2016)简介（尹虎）.....	14
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研究（聂友军）.....	19
◆学术动态.....	27
◆征稿启事.....	33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2016年9月30日

萨德入韩，美国一举三得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 李宗勋

一、萨德入韩是美国对中挤压和包围政策的重要环节

萨德入韩，说到底是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把戏，对美国来说，萨德入韩可谓一举三得。第一，可保障驻韩美军的安全；第二，是管控中国军事力量的绝佳机会；第三，不但通过北约东扩牵制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而且此次又能从远东遏制俄罗斯在亚太方面的实力。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回归亚太、TPP、干涉南海局势等策略全面挤压中国，以谋求其世界唯一霸权地位。而此次强行在韩国设置萨德系统，与其说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朝鲜的弹道导弹对韩国的袭击，不如说是对中国国防直接“合理”管控，是其总体战略的延续和加强。因此，美国不顾韩国各反对势力的强烈抗议，迫使韩国政府同意引入萨德，进一步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达到挑拨中朝、中韩关系的目的。而且为了迷惑韩国民众，宣称萨德入韩的一切费用由美国负担，只要求韩国政府提供场地。但稍知内情的人都知道，驻韩美军的大部分费用由韩方支付，因此即便美国一开始支付一点，但将来的大部分还得由韩方承担。驻韩美军的费用一直在涨，但韩国政府也一直按美军意愿如数交付美方。美国从来就不做赔本的“买卖”。

二、萨德对韩国来说意义不大

首尔是韩国的核心，也是占韩国四分之一人口的人口密集区，而萨德如果设置在庆尚北道的星州，首尔就不在萨德防御范围之内，因首尔地处萨德防御射程 200 公里以外区域（星州离首尔约有 300 公里距离）；其次，对韩国来说，来自朝鲜的巨大威胁还是重型火炮对首尔的袭击，朝鲜经常警告韩国的“瞬间让首尔变成一片火海”并非危言耸听，而萨德对朝鲜的这种军事威胁同样起不到什么作用；最后，从朝鲜经常

试射潜射导弹情况来看，朝鲜是在考虑躲避萨德拦截导弹的预案，也就是说要想通过潜艇导弹近距离直接攻击韩国某些重要目标。而萨德只能正面拦截弹道导弹，对来自其他方位的导弹或短距离导弹仍然失效。此外，韩国政府也已正式解释说，萨德主要防御韩国中南部地区，显然与主要防御包括平泽、群山、浦项、釜山地区在内的美军基地有关。总之，不能保障首尔安全的萨德对韩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韩国多半是屈于美国的压力而引进萨德的，因韩国从来就是一个没有完全军事主权的国家。

三、朴瑾惠政府是在“玩火”

表面上看，韩国政府对美国 2014 年就提出来的萨德问题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没有马上迎合美国，并对外宣称韩国正在研讨这个问题。其实，韩国不会拒绝美国引入萨德的强烈要求，只是等待恰当的时间点宣布。萨德入韩，韩国政府考虑最多是中国方面的反应。近两年，韩国政府在对北政策上为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以达到其孤立和全面制裁朝鲜的目的，不但积极参加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等活动，而且也不想过早地刺激中国。然而，待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处于“麻烦”境地、中国即将在九月份举办杭州 G20 会议、朝鲜频繁试射导弹之际，韩国政府终于在 7 月 7 日这个节点宣布引进萨德。即韩国政府可能认为，在这个时点中国政府不会反应过激，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朝核问题上也不能“出尔反尔”。

但韩国政府应清醒地认识到，萨德入韩，不仅仅是屈从美国，履行美韩军事同盟义务的个案性简单问题，而是引火烧身，为了美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更有甚者，整不好韩国会成为促使半岛及至东北亚局势极度恶化的主犯。韩国政府能负得起如此大的责任？半岛国家应牢记历史教训，不能重蹈覆辙，不能使半岛再次成为大国角逐场所和战争策源地。

四、萨德入韩应与韩、美下届总统选举有关

朴瑾惠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期均只剩下一年半时间，因此他们今后出台的政策大多考虑所属党继续执政的问题。前不久，奥巴马已明确表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同时也预感到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并非等闲之辈，二者支持率不分上下，实力旗鼓相当。所以，奥巴马会利用政府的各种资源和措施确保

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当选，其中一个重要的牌就是压制中国以赢得更多选票。这是民主党的惯用伎俩，最近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公开且加紧围攻中国，催促韩国尽早引进萨德皆为上述策略的具体体现。从美国的惯用方式来看，它的各种遏制中国的行动并非真的要与中国真枪真刀地干一把，而主要是给国内选民看的，即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朴瑾惠更是期望现在执政的新国家党下一届继续执政，这是她卸任以后能够安度晚年生活的最有力保障，因韩国的总统文化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下一届总统选举，必须取得美国方面的支持，虽然美国不能直接左右韩国的大选，但美国的各种因素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在这重要时期朴瑾惠政府当然不能得罪美国，不惜以牺牲韩国的重大利益和中韩友好关系大局为代价，最终决定引入萨德，尝试一场危险的政治赌博。

执政的新国家党能否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取胜，关键在于怎样争取“湖南地区”选民的支持。在前不久的第20届国会选举中新国家党惨败，但他们同时发现，一向绝对支持民主党的湖南选民也出现很大变数，下次大选中也可能出现反对民主党支持新国家党的倾向。韩国政府明确宣布，萨德系统将主要防御韩国中南部地区（包括湖南地区），且将发射地点选定在距离湖南较远的庆尚北道，这些不能不说执政党具有拉拢湖南选民，取得他们好感之嫌。

五、韩国政府的两大误判与萨德问题

韩国政府的战略决策者及保守党议员大多是留美博士或有美国背景的人士，他们亲美、随美、炫美，崇尚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相反，真正懂中国的专家却很少，即使有中国专家，他们往往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体制倾向者还大有人在，所以，难免对世界格局及东北亚局势造成较大误判。

韩国政府的一大误判是，仍然视中国为冷战时期的中国。由于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唯一维持冷战状态中的区域，南北政权分断，民族隔绝，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等，韩国为数不少的人一直保持冷战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以这种思维同样看待现在中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他们还视中国为意识形态浓厚型国家，仍将中朝关系看作是同盟关系，依然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敌对或为西方国家所孤立等，更不懂中国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新理念。殊不知，现在的中国是一切以国家核心利益为重的务实型国家，不像过去那样唯意识形态为重，与朝鲜的关系也逐渐朝着一般国家间关系转化，并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西方国家一道在全球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

中国一直奉行的“反对国强必霸”、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以及冷静不偏的朝鲜半岛政策均证实了崛起之后的中国国情。如果韩国继续一味追求美韩同盟关系，把中国当作当年苏联的角色，甚至疏离中国，与中国敌对，将是一个不明智且有害于本国的错误选择。

另一大误判是，仍视美国为韩国唯一救世主。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地球命运共同体趋势已势不可挡。韩国的经济腾飞和近数十年的崛起都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取得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相对平稳，韩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飞速发展，促使韩国社会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一些韩国政治家却认为，韩国的崛起是美韩同盟关系的结果，是驻韩美军的威力保障了韩国稳定发展。韩国决定引入萨德，还与部分政治家唱衰中国有关。近两年韩国部分人士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在唱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很严重，中国将会因为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南海问题、体制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多麻烦，而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所以战略上还要依附于美国。还有个别韩国专家认为，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小，这样的趋势将有增无减。

其实，韩国部分人士的这种思维是很危险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已近强弩之末，特别是在军事上实施全球战略，铺面太广，战线太长，它的同盟国理念也不同于二战及朝鲜战争时期。冷战结束以后，它在朝鲜半岛实施的战略无非就是制造半岛紧张局势，诱使韩日购买它的军火，平衡和牵制有利于美国的东北亚均势等。这些都是东亚人有目共睹的，韩国要将本国的命运完全依托于这样的美国不得不说是一种特别轻率的想法。

中国的崛起不会如此短命，而是要继续发展，进一步强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是韩国的邻国和广阔市场，中韩两国已构成社会经济合作非常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与韩国的利益和命运息息相关。

六、中国该如何应对？

既然萨德入韩的根源在于美国，中国不必将应对的主要矛头指向韩国，情绪高涨，并动辄要对韩国实施经济等各种报复。因贸易关系是相互的，两国还刚刚启动自贸协定，各种合作关系不应因此而前功尽弃，否则对两国都很不利。而且也应理解韩国方面在萨德问题上的焦灼心理，今年以来，朝鲜不但进行了第四、五次核试验，还试射了包括“飞毛腿”、“芦洞”在内的弹道导弹 14 次共 27 发，并扬言要首先攻击韩国的重要目标，你让韩国不采取任何有效应对措施也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应让韩国政府知道引入萨德的代价是什么，疏离中国、盲目屈从美国将意味着什么，并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牵制韩国的同时，继续保持与韩国的合作关系。因韩国毕竟仍是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可以争取的力量，同时在南海问题仍然复杂严峻的状态下，中国不应树敌过多。

在目前局势下，中国更应将着重点置于联俄挤压美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上。保持与美国的大国关系固然很重要，但美国在南海、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公开向中国“剑拔弩张”，中国安保处在“火烧眉毛”之际，中国也应积极“亮剑”，在军事上拿出什么硬东西进行挑战。在保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快速寻找解决中朝关系的突破口是当下中国外交的紧迫课题。

中日韩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浙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 安成浩

一、中日韩海洋史研究动向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 196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 1998 年开始至 2007 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

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1970 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1990 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

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

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

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

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木浦大学岛屿文化

研究院从 2001 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 2012 年底已出版 25 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

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 1970 年代就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 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二、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

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

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

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

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一带一路”东亚战略思考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王勇

2015年10月，笔者赴日受颁“国际交流基金奖”之际，先后接受《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等主流媒体专访。其中《日本经济新闻》长达3小时的访谈，集中于“一带一路”话题，从中强烈感受到日本社会弥漫着两种极端情绪：（1）对“丝绸之路”充满憧憬；（2）被“一带一路”冷落而焦躁不安。（专访报道《日本应该参与“一带一路”》，见2015年10月31日《日本经济新闻（朝刊）》）

回眸历史，日本是“古丝路”最大的受益者、最出色的模仿国、最忠实的继承人之一；瞻望未来，我国在打造“新丝路”过程中，日本会扮演什么角色？冷眼旁观者，抑或恶意阻碍者？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加以思考。

一、日本的“丝路”情结

日本民众对“丝路”的深厚情结，大概除中国之外世界首屈一指，最具代表性的是NHK（国家电视台）的“丝路”大型系列节目。

早在1980年，NHK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丝绸之路》12集，从当年4月到次年3月，每月播放1集，收视率高达20%以上；1983年4月开播《丝绸之路续编》18集，收视率有增无减；2005年制作《新丝绸之路》10集，2007年播放新版《新丝绸之路》7集。“丝路”题材的系列节目，被誉为NHK经久不衰的高收视率经典作品。

日本人的“丝路”情结，与中国文化两次东传高潮有关：（1）3-5世纪，日本称作“吴”的江南文化传入日本，其中“吴”姓女子等传授蚕桑、纺织、制衣技术，至今日本的和服店多叫“吴服屋”，奉吴姓女子为始祖而供奉于神社；（2）隋唐时期日本举国学习中国，摄取包括西域文明在内的国际文化，自兹“唐风”遍扇日本千余年，一直到明清时代还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船为“唐船”、中国书为“唐本”。在日本语境中，“丝路”带有浓郁的大唐色彩与文化意象。

二、日本与韩国的忧虑

在《日本经济新闻》采访中，日方提供的资料中有一张地图，后经核实系 2015 年 4 月中央台《一带一路绘就发展新蓝图》公布的“一带一路”版图，其中有南海、中亚、东南亚 3 条主线，而日本与韩国未得一席之地。

2015 年 10 月，中韩签订《关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欧亚倡议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把韩国纳入总体规划之中，东亚区唯有日本成为悬念，日本社会的焦躁感、猜疑性大概来自于此。

据中国社科院沈雁昕汇总 2015 年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评述，总体上正面评价居主流，然而全部为欧美及南亚的反馈，未涉及韩国、日本的舆论动向。据我所知，日本经济界的互动、主流媒体的评述、政治家的言说、网络上的传言，显示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绝不亚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

三、中日错位的原因

先看中国方面。“一带一路”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层面议论甚多，对历史的全程追溯与对未来的长远预测着力不够。

“丝绸之路”是 19 世纪末普鲁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创的概念；习主席倡导的“丝绸之路”具有引领世界、导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核心是“政治互信、经济交融、文化包容”，在执政理念上与同一时期提出的“中国梦”、“周边外交”相辅相成。

习主席要求在周边外交中，“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传播“一带一路”的“中国声音”可谓不遗余力，但对同时“讲好中国故事”尚未竭尽全力，而在人文领域中日之间有太多的“好故事”可讲。

再从日本方面看。朝野沉醉在“古丝路”的浪漫情调中，无论情怀还是目光远离现实的中国，他们的文化情结维系于传统中国，自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对当代中国不仅漠视，甚至鄙视。于是产生如此怪相——一方面极度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另方面对华感情跌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今年 3 月 12 日，日本内阁发布的民调显示，厌恶中国的民众达到 80%以上，而这些人大多信奉中国传去的佛教、遵守儒教的道德伦理、爱读《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喜吃中国风味的料理，这中间的巨大反差令人深思。

四、拓展东亚区的思路

“一带一路”是我国在“古丝路”辉煌成就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囊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的国际大战略，其面向未来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关注东亚区块。据中新社2015年3月4日报道，曾任中国驻韩大使、现任驻日大使的程永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中国应利用文化的纽带和密切的经济联系，用‘一带一路’的理念向东加强与日本、韩国的交流与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中，包涵民族、政治体制、经济水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的区块，应该有针对性地擘画局部战略。就东亚区而言，政治上尚缺乏足够的互信，经济上一体化进程先行，文化上认同感颇高，故可走“文化奠基、经济开道、牵引政治”的三步曲，尤其以夯实文化基础最为关键：

(1) 弘扬传统文化：纵观历史，在宋元、明清鼎革期，周边国家萌生“华夷变态”思想，即在尊奉传统中国文化前提下，认为中国从“华”沦为“夷”，日朝继承体统而从“夷”升华至“华”。近现代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以及右翼政客，正是利用这种歪论误导民众，催生当前的怪相。我们应该大力宣传“一带一路”是对“丝绸之路”的继承和扬弃，尤其是振兴日韩视为祖庭、圣地、源头的儒佛道文化，争取把“古丝路”憧憬转化为“新丝路”情结。

(2) 讲好中国故事：千余年来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堪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一些在国内已被淡忘的人物，在日韩却被奉若神明。日本的神社寺庙及祠堂中，徐福、鉴真、白居易、杨贵妃、朱舜水等被祭上神坛，受到民众摩顶礼拜。九州的节庆花车中宋人装束的塑像，背书“日本国大恩人谢国明”，这位杭州人在“丝绸之路”上传播中国文化的事迹，应该由中国人去发掘传颂，融政治“声音”于历史“故事”之中，必能奏事半功倍之效。

(3) 开展人文外交：当今东亚地区政治博弈、经济摩擦频发之际，开展人文外交乃改善国民感情之有效途径。兹举二例：2004年西安发现遣唐使井真成墓志，次年爱知万国博览会展出实物，据统计超过60万观众为看此碑前往参观，井真成系玄宗皇帝敕命安葬，体现大国外交的人文情怀，值得大力宣扬；大阪每年一度的节庆花车中，必会出现“裴世清”真人秀，这位608年赴日的亲善使者的故事，流传日本千余年而不衰，也需要我们去讲述。

千余年来，经由“丝路”传播至周边国家的文化，或珍藏至今，或化为骨肉。我们不能任其变为海外“文化孤儿”，应激活其中国文化基因，有助于“新丝路”建构。

当代韩国工人运动典范： Yoosung 工会运动(2011-2016)简介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虎

2013年2月，朴槿惠当选总统后立即设定了劳动市场改革目标，推行了以两大方针、五大法案为主要内容的变革政策。然而3年多以来其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劳资冲突不断升级，出现了一系列气势高昂的工人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属 Yoosung（유성）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会运动。

Yoosung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Yoosung 公司）成立于 1959 年，是家韩国的汽车发动机配件制造公司。它掌握较好的生产技术，因此，其产品广受欢迎，不仅大部分产品会被现代、起亚等汽车大公司所采购，部分产品还销往海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Yoosung 公司毕竟是仅有 7 百多名员工的中小企业，除了汽车行业，知道其公司名的人并不多。然而，就在 2016 年，Yoosung 公司的工会运动（以下 Yoosung 工会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人权、宗教、劳动等各界人士参与，影响波及社会多领域的“Yoosung 事态”，不仅成为韩国劳动界反对财阀斗争的桥头堡，还冲击了现行多元工会制度，引起韩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其公司名也被社会各界所知晓。

一、Yoosung 工会运动的开始和展开（2011-2015）

2011 年初开始，围绕着夜班制度的改变，Yoosung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工会（以下 Yoosung 工会）与公司、雇主一方（Yoosung 资方）进行了长达 5 个月的谈判。Yoosung 工会主张，夜间作业加重工人的疲劳感，可能成为安全事故的根源，并举出过去 2 年间 4 名员工因过劳引起的健康问题失去生命的实例，强烈要求公司一方取消夜班制度。对此，Yoosung 资方则主张，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维持夜班作业是不可避免的。经 11 次劳资双方交涉，1 次相关部门的协调未果后，为了争取合法权益，Yoosung 工会于 5 月 13 日进入部分罢工程序。2012 年初，韩国忠南劳动人权中心对 Yoosung 公司员工实施的“劳动者心理治疗”调查显示，约 40% 的受检者处于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亚健康状态。由此可见，Yoosung 工会的要求有着其合理的一面。然而，Yoosung 资方对此不予理会，

采取强硬手段来对应。不仅关闭了罢工部门，还禁止工会会员进入工厂。2011年7月15日，Yoosung 资方还建立起第二工会，试图以此来瓦解工会势力。对于公司一方的“暴行”，Yoosung 工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过程中，数十名工会会员被警方拘留，受到100多次行政警告，罚款金额也达一亿多韩币。此外，2014年11月，Yoosung 工会还将第二工会告上法庭，提出第二工会是公司一方的御用工会，不具合法性的主张。

2011年1月Yoosung 公司举行第一次劳资交涉以来，双方矛盾一直没有缓和，随着劳资双方都采取积极寻求“外援”的措施，反而出现了冲突进一步加剧的倾向。2011年5月，Yoosung 资方首先请来称之为“工会终结者”的创作咨询劳动法务公司（以下创作咨询公司）作为帮手。参与Yoosung 公司劳资纠纷后的创作咨询公司通过主持“争议行为战略会议”，策划了以组建御用工会为代表的诸多打击工会运动的计划。Yoosung 工会一方则得到人权团体、劳动界、法律界、宗教界、大学生组织等各界的支持。2014年3月15日，全国35个地区韩国民主劳动工会总联合（以下民主劳总）会员和上述社会各界人士约5千余人，在Yoosung 公司总部前举行了声援Yoosung 工会斗争的活动。为了防备突发状况，朴槿惠政府派出3千6百多名警察来维持治安，声援活动场面可谓壮观至极。2015年12月，Yoosung 工会与26个市民团体一同组建了《援助Yoosung 公司劳动者的共同对策委员会》（以下对策委员会）。其中，民主化律师协会、民主化教授协会、民主主义法学会、劳动人权劳务师协会、基督教和平委员会等团体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工会一方的实力及影响力。对策委员会强烈要求政府采取特别劳动监督措施，迫使Yoosung 资方改变打压工会的方针，并严厉处置以非法手段打击工会组织的责任人。

二、2016年 Yoosung 工会运动的转折与新局面

2016年初开始，处于胶着状态的Yoosung 劳资纠纷迎来了“意外”转折，导致Yoosung 工会运动进一步高昂。此次转折主要由“现代汽车公司干预Yoosung 工会运动的内幕曝光”和“工会会员的自杀事件”推动。两个月不到的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两次突发状况造成了巨大影响及冲击，将Yoosung 工会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一）现代汽车公司干预 Yoosung 工会运动的内幕曝光

2016年1月28日，民主党议员 Eun Sumi（은수미）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现代汽车公司参与打击Yoosung 工会活动的证据。因Yoosung 工会运动直接影响了主要产品采购方现代汽车公司的生产进程，为了保障配件的稳定供应，现代汽车公司开始

主动干预 Yoosung 公司劳资纷争。现代汽车公司定期与 Yoosung 资方、创造咨询公司举行三方会谈，分析工会斗争的动向，并商讨了对应之策。现代汽车公司还直接给 Yoosung 资方下达了建立御用工会等具体指示。121 次相关会议记录以及业务邮件都成为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据。在韩国财阀中排名第二的现代汽车公司对中小企业 Yoosung 公司劳资纠纷的介入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广泛瞩目，媒体也对 Yoosung 工会运动进行了跟踪报道，进而加深了民众对 Yoosung 事态的认识和了解。面对新形势的出现，对策委员会立刻举行高层会议决定将反对财阀斗争列入 Yoosung 工会运动范畴，并在现代汽车公司总部前设立示威活动的据点，开展了连日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

（二）工会会员的离世

2016 年 3 月 17 日，Yoosung 工会会员 Han Goangho(한광호)自杀身亡。他生前与 Yoosung 资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两次处分，还曾在与公司一方的争执中受伤。高强度的工作、不稳定的生活、资方对他的侮辱和监视使其在精神上的备受折磨，最终选择了“离去”。同伴的死讯激起了工会一方强烈的愤慨与斗志。对策委员会立即以 Yoosung 工会、民主劳动总联牙山支会、大田忠北支部会员为主力，在现代汽车总部前建起 Han Goangho 的灵位，举行大规模追悼活动的同时加大了抗议活动的规模和力度。现代汽车总部成为了 Yoosung 工会运动乃至韩国劳动运动的前沿阵地。面对总部前长期持续、规模逐渐扩大的抗议活动，2016 年 5 月 21 日，现代汽车公司出动安保人员强行拆除了工会运动据点。这一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冲突，共有 18 位工会会员被警方拘留。Yoosung 工会斗争中死者的出现及现代汽车总部前数百人规模的冲突局面，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韩国政界也开始对 Yoosung 工会运动发表见解。例如，韩国正义党劳动委员会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发表支持 Yoosung 工会运动的宣言，并强烈谴责现代汽车公司破坏 Yoosung 工会组织的行径，建议监察部门公正执法，处置有罪之人。Yoosung 工会运动迎来了新的局面。

（三）有关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的裁判

2014 年 11 月，Yoosung 工会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主张 Yoosung 公司成立的第二工会不具自主性，其设立目的是为了打击工会势力，是彻头彻尾的御用工会，应依据劳动法取缔受资方掌控的第二工会。对此，Yoosung 资方则主张，第二工会的成立得到行政部门的认定，工会提出诉讼是不合理的。

2011 年 1 月 1 日，李明博政府颁布《劳动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改变了单一工会原则，允许劳动组织内组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会，从此韩国进入多元工会时代。有关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的裁判是多元工会制度下 5 年多以来首次涉及御用工会(老

板工会)的案例,具有特殊意义。

2016年初 Yoosung 工会运动出现转折,受到韩国舆论普遍关注的背景下,受理有关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案件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也加速了对该案件的审理进程。2016年4月14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 Yoosung 资方主导的第二工会不具合法资格,因此它与 Yoosung 资方所签署的薪金条款等协定无效。主审法官 Jeong Heuicheol(정희철)指出,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在资方主导下成立,人员构成、运营方式都受公司一方的严格管控,体现出附属关系,显然难以保障工人权益,本法庭认为应取缔该工会组织。经过1年半艰难的法庭攻防战, Yoosung 工会最终赢得了关键性的宝贵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工会运动的成果。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是雇主不公平劳动行为(unfair labour practice)的产物。其危害在于破坏工会的独立性,致使工会不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各项活动都要以雇主、资方的根本利益为导向。此次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有关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的判决有力制止了这一不公平商业行为(unfair trade practice)的蔓延。

三、Yoosung 工会运动对我国学界相关研究的启示

通过有关 Yoosung 工会运动和韩国劳动问题的分析,中国学界不仅可以把握亚洲工人运动的走向,了解各国执行国际劳动公约的模式,也能加深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供应链中劳动问题的认识。

(一)有关韩国劳动问题的研究方面

从2015年5月开始启动的朴槿惠政府的劳动市场改革,遭遇到在野党和劳动界的强烈反对,不仅“劳动市场改革五大法案”未能在第19届国会中获得审议资格,“劳动改革两大方针”的实施也处于举步难行的境地。大国家党在2016年4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失利后,朴槿惠政府的劳动市场改革几乎失去了推进的动力。Yoosung 工会运动激烈的斗争局面,清晰地反映出了当前韩国社会尖锐的劳资矛盾,也体现出朴槿惠政府劳动市场改革所处的困境。这又说明着在有关韩国劳动问题的研究中采用“以小问题把握大局面”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此外, Yoosung 工会运动在推进过程中经历了多重目标的设立,法庭攻防战,运动主导方的变化,各种势力的渗入等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并不多见的复杂的斗争局面。可以说,为了正确地把握韩国劳动运动的本质及未来走向,导入更加缜密的分析法和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已成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有关雇主不公平劳动行为（unfair labour practice）的研究

Yoosung 公司通过设立第二工会来削弱工会势力的做法是典型的雇主不公平劳动行为。国际劳工立法中关于不公平劳动行为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 87 号《结社自由和保障组织权利公约》和第 98 号《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两项公约。例如,第 98 号公约中明确提出,要防止雇主对工人的“歧视行为”和对工会的“干涉行为”。有关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的判决以法律判例的形式规范了不公平劳动行为,保证了工会的独立性,还实现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统一。这一判例体现出韩国接受并执行有关不公平劳动行为的国际公约的积极立场。为了维护我国的劳动市场秩序,保证国际公约在中国的顺利推广,我国不仅要重视行政手段,也应进一步关注法律判例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而且, Yoosung 公司第二工会的判决是韩国第一例有关御用工会的判例,对于我国学界而言也有着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三）有关供应链中劳动问题的研究方面

供应链可分为生产者主导型和购买者主导型。生产者主导型出现于资本、技术集约型产业（例如：APPLE、FORD）。在供应链顶端制造最终产品的大企业控制着全局,下部企业则负责零部件的生产。购买者主导型供应链出现在劳动集约型产业,主导企业是负责设计、流通、销售的品牌企业（例如：H&M、ZARA）。近年来,生产者主导型企业越来越显现出倾向购买者主导型企业的特征。现代汽车公司与 Yoosung 公司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为,在具有购买者主导型特征的生产主导型供给链中主导企业与下部企业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不仅出现了大量跨国生产供应链中的下部企业,国内供应链的网链结构也变得越来越细化。因此,如何能在国内乃至跨国供应链中,明确主导企业的责任,保障下部企业员工的劳动权利,这不仅是韩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然而,对于如何把握供应链的性质和模式,明确供应链中主导企业与劳动问题的关系,中国学界相关研究还不能给予充分的解答。以 2016 年现代汽车公司干预 Yoosung 工会运动的事件为契机,韩国出炉了较多有关供应链中劳动问题的成果,这些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学界加深理解供应链模式,把握供应链中劳动问题和主导企业责任的重要材料。而且,韩国劳动界所提出的如在了解劳动问题的跨国化和趋同化的前提下,要求主导企业明确其供应链的组成结构及范围并承担供应链中劳动问题的责任等立场和理念,对于我国学界而言也具有深入探讨的意义。

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研究^①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聂友军

钱钟书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又从西方现代社会、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中受到启迪，在丰富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借助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卓然自成一家的翻译理念。钱钟书的翻译观比较全面地体现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另有大量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钟书广泛论及翻译的标准与原则，翻译的过程，译者的功用，并将其翻译思想高度凝练为“化境”说。

一、译事之信，当包达、雅

“信达雅”是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基石，它强调忠实于原作和翻译修辞的重要性。钱钟书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创造性地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②“信”、“达”、“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包含“达”与“雅”。要做到“信”，不仅要传达原文“义旨”，而且译文“风格”也求与原文一致。钱钟书在论述支谦的《句法经序》时提到：

维祇叹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以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③

“易晓勿失厥义”，一方面要求通俗易懂，既要符合译入语规范，又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水平，此之谓“易晓”；另一方面又要遵循“信”的要求，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一样或大致相当的感受，是谓“勿失厥义”。

^①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 2014 年度科研计划项目 2014 年度科研计划项目“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研究”[课题号 Y201432137]成果。

^②钱钟书. 管锥编（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101。

^③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01。

“雅”之意不在“润色加藻”或“文饰”。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完全抛弃原文的语言习惯而润饰译文。钱钟书援引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中的说法：“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至于借粉饰、雕琢而成的“美言”，在措词、行文、乃至形式上与原文有较大出入，其可信度当然大打折扣。与“美言”相对的则是通过“径达”途径达到的“信言”，其特点是“因顺本旨，不加文饰”。

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严复《天演论·绪例》所谓‘信达雅’的‘达’。”并进一步解释道：“‘不隔’，不隔离着什么东西呢？在艺术化的翻译里，当然指跟原文的风度不隔……同样，在翻译化的艺术里，‘不隔’也得假设一个类似于翻译的原文的东西。这个东西便是作者所想传达给读者的情感、境界或事物。”严格遵循不隔的标准，“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翻译中的“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译成浅显易懂；原来浅显的在译文中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让译文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看清楚它的糊涂，这才是“不隔”。

关于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达致信、达、雅的标准，钱钟书给出了两条具体途径：一是回归文本。回归文本是解读、批评与翻译的根本：“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①钱钟书同时提倡到岸舍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不信书则如无书”^②。认死理、参死句、刻舟求剑式的穿凿附会，或脱离作品、郢书燕说、随心所欲，都会产生游谈无根的弊病。意义既得，则当忘言，不暧昧故能清明，不黏着方能灵活。回归文本不仅要认真分析原文的一切用词，分析原文产生的原因，还要分析人们是怎样理解原文的。

解决办法之二是整体观念。钱钟书反对“铢称寸量而见小忘大”、“执分寸而忽亿度，处把握而却寥廓”^③；而提倡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④，即注意在上下文即语境中考察文本的意旨。钱钟书将“阐释的循环”与《华严经》中的“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相映发，指出细节只能通过整体才能得到理解，而对细节的任何解释都决定着对整体的理解，要全面、正确地进行阐释，就要结合语境进行部分与整体双向互动。钱钟书肯定林纾的翻译，就是从文学的整体观念出发的，因为以细节而论，林译不乏失真之处，但通篇观之，却大得原著精神。

^①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0。

^②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5。

^③钱钟书. 管锥编（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903。

^④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0。

二、言不尽意，心手相违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深有体会地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①这段话涉及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困难与矛盾，包括原语与译入语的差异、言不尽意、心手相违三个层面。

（一）语言差异

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之间存在距离，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讲，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决定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傅雷认为：“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西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②表现在语言的形式结构上，差异是巨大而明显的：西方语言学有一套自觉的语法体系和语言哲学理论，重视性、数、格、人称和时态的变化，是典型的形态化语言；汉语句法讲究以意为主，语法具有隐含性，而不注重讲求形态和形式的接应，不具备屈折型形态表现手段。

不同语言的各个层次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通道，这就限制了翻译转换的彻底实现，亦即存在“可译性限度”。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文化障碍，因为“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气力加以解释”。^③文化差异涉及生活习俗、政治历史、思维方式等许多内容，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语言又把这些内容表达在文本中，因而对译者的困扰也较多。

翻译是一项包括原文本与译者、译本与译入语读者之间动态作用的综合活动，它寻求与原文本的对等。^④翻译生成一个用译文读者的语言写就的文本，要求紧密依托原文，以做到不“失本”。同时，译文又不能是原文字当句对的转换，而必须有所超越，避免出现生搬硬造的“翻译腔”。变通的依据是译文自然流畅，符合译入语规范，最大限度地忠实表达出原作意义的内涵与外延，原作的体裁与形式，及原作者的风格与情感，达致一种与原文基本相当的美学效果。

（二）言不尽意

人在思维时，头脑中产生的是意象，这时最能体验到意思；一旦开始说话写作，

^①钱钟书. 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80。

^②转引自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393。

^③王佐良. 翻译与文化繁荣.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34。

^④ Nida E. Principles of Coirrespondence. Nida E. Language and Cultur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意象变成语言，想到的意思就开始走失；而当人们把所说的话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走失的意思就更多。钱钟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得意忘言，则将以词害意，以权为实，假喻也而认作真质（converting Metaphors into Properties）。”^①有西方学者也曾指出翻译是一种必要的然而又无法真正完成的任务。

“言不尽意”不是言不达意，恰恰相反，言的无限分延性，使有限的言辞可以表达多重、甚至无限的意义，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并为读者、批评者和译者创造出无限的阐释空间。钱钟书在翻译《弗·德·桑克梯斯文论三则》时所作的“译者案”指出，贯穿在德·桑克梯斯文论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作家的意图与作品的效果往往不相符合，以至彼此矛盾，即现代西方文评家所谓“意图的迷误”（intentional fallacy）。^②读者、批评者、译者面对具有“文外之重旨”、“文外曲致”的文本，总会在自己特定的文化知识、审美喜好的基础上阅读、理解和接受“文情难鉴”的文本，发挥一定的创造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有限的、暂时的解读，有时难免会取主观印象式的解读路径。

（三）心手相违

表达是理解的结果，但理解得正确并不意味着表达得完美，还要用修辞技巧来对译文进行反复推敲和细致琢磨。艺术传达是“心”、“手”、“物”协作的结果，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系统论述了三者间既协作又乖违的关系：“自心言之，则生于心者应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自物言之，则以心就手，以手合物。”^③《管锥编》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一艺之成，内与心符，而复外与物契，匠心能运，而复因物得宜。心与手一气同根，犹或乖睽，况与外物乎？心物之每相失相左，无足怪也。”^④指出心与手本于一人，仍有不协调、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心与物之间的相乖相违情况不难理解。

阐释学“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切地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文本不再被看作读者能够准确解读、意义确定自足的文字结构，文本意义的实现与阐释活动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参与。译者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所熟悉世界的知识带进原文这个陌生世界，这时只有抛却个人成见、偏见和癖好，尽量接近作者的“视界”，使自己的意识与作者相契合，才能把译著的读者带入原著读者同样的气氛中去。

^①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

^②文汇报[N]，1962-8-15。

^③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0。

^④钱钟书. 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三、作为读者的译者

在传统译论中，译者是原作者或原文的奴仆，译文是派生的、模拟的，一个不似原本的假象；在当代译论中，特别是多元系统论者看来，译者又沦为历史文化这只无形的手操纵下的傀儡，成为被动的传译工具（passive reproducer）。钱钟书一反传统译论与当代言说的偏颇，公允地指出：“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①秉持这样的理论自觉，标明翻译是一种“居间”的中介，以帮助实现“沟通”为职责，突出译者的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

翻译是一个克服矛盾的过程，译作之美需要译者进行艺术创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是原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尽量保证理解客观；然后是译文作者，也可谓原著的合作者，以原作为准绳，寻求与原作者最大限度的接近；最后还是译文修正者，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其接受性，对自己的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译者通过重新建构来再现原作，从外部阅读入手把自身写入文本。

译者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正是翻译原则与技巧的核心所在，主要体现在选择原文、决定翻译策略、能动地理解、能动地表达并寻求与原文达到平衡等方面。^②当代翻译理论鼻祖泰特勒指出，译者“必须既用原作者的灵魂、又以自己的发音器官来说话”^③。钱钟书指出：“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 has two handles.），人手当择所执”^④，并进一步提出“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作为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的操作方案。具体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各堕一边；不尽信书，斯为中道尔”^⑤；其二，“正反相‘对’者未必势力相等，分‘主’与‘辅’”。^⑥规避盲信盲从或虚无主义的极端做法；辩证地“执其两端用其中”，也不是平均主义的折衷，还强调要分清主次。

（二）误读与创造性叛逆

^①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40。。

^②按照斯坦纳的观点，翻译的步骤有四：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信赖”即相信原文是有意意思的，译者必须加以透彻理解（这种信赖可能是不自觉的）；“侵入”是译者直觉中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吸收”原文是一项思维活动，但它以语言的使用为标志，对于引进的成分会有各种各样的同化和应用，难免会有程度不等的走失；“补偿”即把原有的东西归还到原来的地方。

^③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6。

^④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7。

^⑤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8。。

^⑥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6。

阅读过程中，修正的期待和转化的记忆之间显然存在一种连续的相互作用；相应地，翻译过程中，“误读”在所难免。钱钟书说：“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①语言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差别决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多义性、片面性和变动性等特征，读者和译者理解方面也会有所出入，有时甚至是有意为之。抛却错误理解姑置不议，不获尽解而产生的曲解就是“误读”。误读与中国古典文论中津津乐道的“诗无达诂”异曲同工。钱钟书说：

《春秋繁露·精英》曰：“诗无达诂”，《说苑·奉使》引《传》曰：“诗无通故”；实兼含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诗之“义”不显露 (inexplicit)，故非到眼即晓、出指能拈；顾诗之义亦不游移 (not indeterminate)，故非随人异解，逐事更端。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必主于一。既通 (dis-closure) 正解，余解杜绝。^②

“诗无通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诗义不畅通，不显露，要从幽隐中加以探索；二是诗义不游移，并非各种说法都可以迁就变通，需避免牵强附会。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并解释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 (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③著名的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叛逆者” (Traduttore, traditore)，及称翻译为“优美的不忠”的法国说法，都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

误读也并非总产生负面影响，在《围城》德译本前言中钱钟书写道：“庞德对中国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高深玄妙的误解增强了莫妮克博士 (Dr. Monika Motsch, 《围城》德译者) 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而莫妮克博士能成为杰出的汉学家；我们饮水思源，也许还该把这件事最后归功于庞德。”这就以近乎戏谑的口吻表明，即便误解也会产生一定积极意义，至少能激起人们探求真相的兴趣。

四、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钱钟书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拈出“化境”说，并标举它

^①钱钟书. 管锥编 (第二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06.

钱钟书. 谈艺录 (补订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609.

^③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 [M]. 王美华、于沛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137.

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以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①这段陈述指出了翻译的本质，即翻译是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代表不同文化的文字间的相互转换；也包含翻译的任务，既要用译入语再现原语信息，又能完全保持原作的风味；还涉及翻译的方法：既要在内容、形式和风味等方面忠实于原作，又要求译文自然、流畅，避免生硬牵强。

《林纾的翻译》开篇首先从语义训诂层面切入，阐述翻译化境中的“化”，并拈出“媒”和“诱”说明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其论述包括三层含义：译者的工作是艺术性的；原文意蕴及原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在译作中尽行展示，一览无余；对原作美丽之处的半遮半露，客观上能激起懂外语的读者阅读原作的欲望。钱钟书称自己正是通过阅读林纾翻译的小说，才引起学外语、读原著的渴望。

钱钟书援引《荀子·正名》对“化”字的解释：“状变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②以言翻译，“化”指语言形式改变而思想内容仍保持一致的语际转换。“化”兼取“出神入化”之意，于科学含义之外又指艺术上的升华。语言中有些东西远非标准化，允许有不同译法，选择的过程就是艺术性的体现；同时译入语文本也必须受到科学的检验，以避免错误，保证质量。与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的纯粹科学活动有所区别，翻译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宗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项科学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活动。化境则指这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过程中，通过主客体交融渗透，建构成的再创造的最高层次（境界）。

按照钱钟书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

^①钱钟书. 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79。

^②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472。

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①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盲者背负跛者，跛者负责看路引导盲者前行的情形，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

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瞽、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瞽：‘您行吗？’瞽答盲：‘您瞧呢！’”^②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瞽二人的敏感与反应的机智——瞽者听到“行”首先想到自己的腿脚，针锋相对地用“瞧”触动盲者看不见的痛处，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对话的本意不外一个问“是否可以”，另一个回答“没问题”，通过语带双关，讽喻效果喷薄而出。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十八世纪德国文家的谚语。^③该译例真正达到了钱钟书所推重的效果，“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读起来决不会像翻译出的东西”^④，可谓翻译“化境”的一个典型体现。

^①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549。

^②“您行吗？”原作“Wie gehts?”，“您瞧呢！”原作“Wie sie se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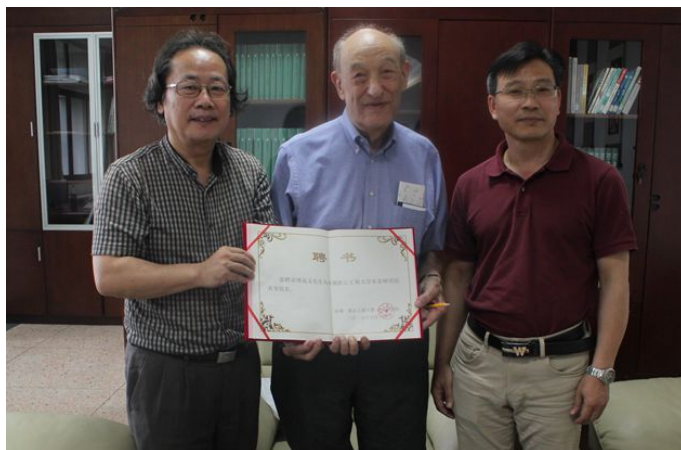
^③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550。

^④钱钟书. 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80。

学术动态

中华日本学会 2016 年年会暨“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2016 年 7 月 1 日—2 日，中华日本学会 2016 年年会暨“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主要探讨了日本社会发展的现状、未来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日本将在东亚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日本研究者今后应该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去研究日本等问题。



会议期间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先生受聘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名誉院长

会议由中华日本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联合承办。并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协助和支持。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团体的相关专家、学者代表、日本驻华机构代表以及媒体编辑等百余人出席研讨会。

（信息来源： 新华网）

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开展编写东亚近代史学术会议在杭州举行

7月14日，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开展编写东亚近代史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承办，来自中日韩的30余位学者汇集一起共同研究编写东亚近代史，目前正在开展第三阶段共同研究，前期已形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两部研究成果。

此次会议在杭州召开，有助于推进杭州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杭州文史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促进了杭州与日韩两国的学术和文化交流，从而扩大杭州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力，提升杭州的国际知名度。

（信息来源：杭州日报）

第七届中日佛学会议筹备会议暨福山哈嶺寺的发展与东亚佛教的未来学术座谈会隆重举行



8月2日，2017年第七届中日佛学会议筹备会议暨福山哈嶺寺的发展与东亚佛教的未来学术座谈会在哈嶺寺传媒中心一楼讲堂举行。此次筹备会议由中国福山哈嶺寺、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山东普觉公益基金会、普觉讲堂、普觉弘法堂等协办。同时，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创价大学、韩国东国大学、中国中央民族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佛学院、南京市委党校、中南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华侨大学、宁波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大学等。知名学者共聚一堂，可谓群贤毕至。

来自日本的菅野博史先生和蓑轮显量先生分别做了《关于〈大般涅槃经集解〉的写本》和《日本佛教的宗观念及其传统》的报告、韩国的张圭彦教授做了主题为《浅谈圆测对真谛〈九识章〉与其九识说的认识》的发言，张风雷先生做了《论五代宋初天台教籍之回归》的论述。

（信息来源：大公佛教）

“东亚思想的传统及其近现代转换”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

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东亚思想的传统及其近现代转换”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于 8 月 26—27 日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梦溪宾馆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日本国立爱媛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国内外近 40 所高校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大会以主题发言和分会场学术研讨的形式，围绕“东亚思想的传统及其近现代转换”的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专家学者视角丰富，围绕“日本及东亚的传统思想”、“日本近现代哲学与思想文化”、“东亚宗教”等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与会学者认为，20 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各国不仅在本国内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不平等问题，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冲突与恐怖主义活动日益严重，人类过度的开发和生产活动也引起了全球规模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人类应该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作为哲学理念，构建人与人共同共生型社会和人与自然生态循环型社会。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国家外国专家局信息中心陈化北主任主持，闭幕式上中华日本哲学会王青会长对本年度获奖的两部著作和两篇学术论文颁奖。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韦立新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分别对各分会场研讨作了准确全面的学术总结。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郭连友教授致闭幕词并对主办此次会议的哈尔滨师范大学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同时祝愿中华日本哲学会越办越好，以此来加深中日哲学间的对话与交流。

（信息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十届“近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会议”在山东大学举行

8月26-29日，由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共同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十届“近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办。

本次研讨会主题是“现代性与区域性：近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共有73位学者提交论文，内容涉及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社会等诸多方面，其中既有气势宏阔的大视野文章，也有小而精致的区域关照与故事叙说，多系作者长期研究、缜密思考、精心撰写的上乘之作。其

视野之拓展、角度之新颖、史料之丰富、评论之客观、现实之关照，都堪称学术研究的新创获。



会议共设置近代东亚国际关系、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战时中国与日本、中国革命叙事再探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1950年代前后的两岸三地、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与宗教、当代东亚的政治与外交等八个议题共十场分组讨论。与会学者在为期两天的分组讨论中，以宣读论文、自由讨论及提问、论文评议等形式，打破学科间畛域，回到历史“现场”，就论文所涉主题、史料运用、叙事话语以及问题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信息来源：山东大学新闻网）

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

9月9日、10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处共同主办“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日本埼玉大学、日本关东学院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西江大学、韩国国民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吉林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等15所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十七世纪以来东亚思想的演变”、“东亚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观察”两大议题展开学术讨论。



会议期间，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黑住真先生、林少阳准教授，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蔡振丰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张崑将教授，韩国西江大学高熙卓教授，韩国首尔大学赵宽子、李垠庚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丁国旗教授，台湾交通大学蓝弘岳副教授，东北学院大学松谷基和准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许怡龄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在两天的学术交流中，学者们各抒己见、互有攻防，围绕着东亚思想史中的个案问题、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展开交流，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